

南宋时期寺院田税的缴纳与蠲免

刘 军 峰

提 要：南宋时期寺院两税的缴纳是政府控制寺院经济过分膨胀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使寺院特权在一定范围内有所限定，对于此时期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亦体现出佛教自身的发展对于世俗王道秩序的遵守。然而有些寺院还享受着一定田税蠲免的特权，这即是来源于世俗政权的“恩赐”，体现其对寺院管理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又是世俗政权对佛教经济强化行政干预的重要表现，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寺院的发展亦因此更为依赖于世俗政权。

刘军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南宋 寺院田税 缴纳 蠲免

一、南宋寺院两税与佛教的发展面貌

南宋时期田赋实行两税制，如无特殊情况寺院都要向政府缴纳夏秋两税，这是寺院田赋缴纳之正税，而就扩大到整个南宋社会来说，夏秋两税的缴纳都是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自南宋建立初期，两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①。寺院户输纳两税，这是佛教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的一个积极的贡献，南宋中期福州地方志《淳熙三山志》对于寺观户与农户的垦田、常赋钱额进行了粗略的比较，其中记载的民户垦田有 35300 余顷，寺观户的垦田总计为 1300 余顷^②，从所占垦田数量上来看，寺观垦田是相当可观的，而这还不包括寺院所占涂田、葑田、山田等类型的耕田。关于寺观耕田的数目《淳熙三山志》之“僧道”条中指出：“今民田若地八万二千余顷，食民五十七万九千，黄中小老不计。浮屠民田若地二千余顷，食僧徒一万四千余人，是民七人共百亩，而僧以二人食之。民产钱八千缗有奇，僧寺一千五百，不啻当民八之一，以故州常赋外，一切取给于僧寺，有以也夫。”可以看出从人均占有耕地的角度看，僧人人均耕地为 50 亩，而普通民户人均耕地仅为 14 亩，如果加上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孩童所占的基数，普通民户人均耕地面积实际上远比 14 亩少得多。另外，记载僧寺产钱总量约为 1500 缗，不抵民户的八分之一，但是如果从人均产出来看，僧寺因其人均占有耕地量远远高于普通民户，其人均产量实际上则近乎普通民户人均产量的 8 倍，在政府制定允许缴纳相同税额的条件下，寺观户明显具有超强的赋税能力，而政府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州常赋外，一切取及与僧寺”^③。从寺院僧众人均

占有大量农田这一现象来看，寺院享有大量耕田的特权实际上并无实质性地改变，仍然反映出此时期佛教发展的某种寄生性的特质，反映出佛教作为宗教所体现出来的非世俗化特征，但是从世俗政权对于僧寺常赋的索取来看，寺院经济发展又带有世俗化特征，其特权的享受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起来，通过世俗政权对其经济非正常发展的控制而体现出与唐及以前不同的面貌，此时期两税的缴纳多少体现出佛教发展过程中所享有特权的相对减少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趋势，成为宋代佛教世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体现。

两税是最基本的土地税，亦为田税，夏税以征收丝帛、大小麦和钱为主，秋税则以粮食为主。寺院所输纳的夏税秋苗两税其形式也并不固定，往往存在折改的情况，有时夏税折成麦、绵、布、柴等实物缴纳，秋税则缴纳相应数量的货币。无论如何，两税属于寺院必须缴纳的定额税，故而一般不会招致寺院的逃避，但是由于寺院往往占据大量的农田耕地，两税的征收方法又依据田亩数量及质量而定，故而寺院的两税负担还是不太轻。据唐代剑在《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一书中的研究，南宋时期福州路僧众所负担的两税约为道士的两倍，而道士负担的两税为民丁的四倍^④。寺院两税的缴纳依据其田地的数量及质量而定，但是各个寺院所拥有的田地数量定然不同，且质量有好有坏，所以无法进行统一的考量，加之寺院所纳两税有些史料中往往只有折算为税钱加以记载的情况。诸如上例中福州僧寺产钱总量约为 1500 缗便是折变为钱的情况。又南宋淳祐年间担任广东转运判官的陈光仲曾收得民户、僧寺夏税及累载畸零，为钱 2300 余缗^⑤。这种情况是南宋时期的普遍社会现

象,也并非单单针对寺院,一个正面的原因是两税实物的缴纳要到指定的处所,其中囿于运输或是储藏条件致使操作多有不便,故而折变为现钱进行征收。这其中的征收原则在于“有常物而一时所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⑥。另外“折变”的产生还主要是其负面的原因,官府根据一时之所需,“轻重相当”进行折变往往存在操作的失范,成为官府巧诈欺民的一种手段,这期间往往存在“增折”的现象,又如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粟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⑦。事实上早在南宋初年高宗时期祠部员外郎胡宁曾对地方上折变两税为现钱的情况进行过批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说:“祠部员外郎胡宁面对论州县受夏秋两税遇输绢之时则不受绢而使输钱,遇输米之时则不受米而使折色,望自今并输正色,毋得折变现钱。”^⑧从前一则史料看,这种呼声完全没有得到有效地响应。

寺院在缴纳田税的过程中,还要提供相当繁重的劳役,这样的结果便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两税加税名目——支移,因为田税实物的缴纳要到指定的处所,而往往运输过程中由于运输工具、路途长短、路状好坏及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往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官府便时常将这部分负担转嫁给纳税民户或是寺观户。南宋著名理学家林希逸在其所著《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中提到:“僧寺之废兴,以吾侪视之,若于事无所损益也。然余观江、湖、浙之和余、运余、淮东西之车驮、夫脚,其为产家害极惨。”^⑨在此提到的运余、车驮、夫脚等实际上就是支移这一税种的具体表现。同北宋一样,南宋政府土地赋税实行两税,然后在两税的输纳过程中还有支移折变这一田税附加,并且政府还制定相关法令条规,以法律的形式将田税及其支移折变列为实际的田赋正税。成书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的《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了寺观田产不得免除税租,其中还讲到不得免支移折变。记载说:“诸寺观(原注:后妃、臣僚之家坟寺、功德观院同)田产不得免税租,其税租亦不得免支移折变,止纳见钱,虽奏请到朝旨或奉特旨,并准此。”^⑩“诸寺观(原注:后妃、臣僚之家坟寺、功德观院同)田产不得免税租、夫役、免役钱及诸色科敷,其税租亦不得免支移折变,止纳见钱,虽奏请到朝旨或奉特旨,并准此。”^⑪从这两条法规条例来看,两税是寺院的常赋,其中的支移折变亦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然而史料中仍旧有许多非法折变的记载,这虽为法律所禁止,但实际上政府处于利益的角度,暗地里还是积极通过非法折变来套取利益,以致两税非法折变多有至数倍的情况出现^⑫,有时折变时“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

民无所诉”,造成了诸多的社会矛盾^⑬。

除了要缴纳两税以外,寺院还要负担其他的租税,《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中曾指出:“僧寺则上供有银,大礼有银,免丁又有银,岁赋则有祠牒贴助,秋苗则有白米撮借,与夫官府百需靡细靡大,皆计产科之。”^⑭根据这样税租压力过大的情况,官府有时亦进行针对性地减免,尤其是在灾荒之年或是寺院困难之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法令规定寺院田赋的蠲免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而且多见于赐额的大寺院,所以政府主动减免一般规模大小的寺院田赋的情况在史料中并不多见,而对于普通的寺院来说,其田赋如若不能减轻,则可能会采取各种遁赋手段逃避田赋的缴纳以减轻生存压力。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寺院两税的缴纳是政府控制寺院经济过分膨胀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对于此时期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杨倩描先生在《南宋宗教史》一书中指出政府通过对寺院进行财政性的控制以限制寺观经济的非正常增长,无疑使传统意义上那种僧道“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局面在南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⑮。实际上正如杨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南宋时期僧道“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状况确实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否足以可否定其所具有的阶级特性?另外值得商榷的一点是:是否是由于政府对于寺院进行经济的财政性的控制从而促使僧道“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局面发生了改变?首先对于僧道阶级性的问题,王曾瑜先生立于历史的角度在其《宋代阶级结构》一书中已有详细地论述,并且讲到僧道作为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不事生产,但维持寺观宗教活动和僧道衣食,却又根本不可能超脱尘世的经济活动^⑯。所以此时期僧道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简单的坐食阶层而加以讨论,而是应结合社会历史及此时期佛教发展的实际情况去看。虽然寺院两税的缴纳确实使寺院特权在一定范围内有所限定,从以上所引种种历史材料看,寺院僧众有时甚至成为世俗政权盘剥的对象,然而从宗教理论的角度去看,这也证明了佛教社会性的发展,证明了“宗教过去是,它也必然地必须是社会性的。”佛教在产生及发展过程中其各个要素迟早要被全面置入社会化大语境中,其信仰的精神层面及物质层面应时时地契合佛教所处的时代,而单从其佛教经济的层面看,两税的缴纳恰恰说明佛教在南宋这一社会历史时期下,其自身发展对于世俗王道秩序的遵守,对于这一点,笔者拟就寺院田税的蠲免及其原因为论述对象作更进一步地探讨。

二、南宋时期寺院田税的蠲免及其探讨

南宋时期寺院田税的蠲免往往需要视情况加以讨论,根据以上几则材料及法令条规看,寺院田赋的缴纳是强制性的,如果被政府下令蠲免则大多具有一定深层次的

缘由。因为同“非时科敷”不同，田赋税租是法律规定的“常赋”，且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因而不大容易被蠲免。如位列五山之首的径山寺在南宋时期是皇家的祝圣寿道场，此寺曾“寻奉俞音”（亦即奉行宋孝宗圣旨之意——笔者按），赐额兴圣万寿禅寺，其在诸州的场务商税亦被免除，并且其平江府和义庄除纳正税外，非时科敷悉蒙蠲免^⑦。这则材料出自《松隐集》之《径山续画罗汉记》，记于乾道癸巳年亦即乾道九年（1173），从中可以看出，径山寺因是皇家的祝圣寿道场而被赐额，这样的寺院其田赋正税尤不能免，而仅仅是免除寺院所承担的非时科敷及商税。

以径山寺为例，结合相关史料，可以窥见寺院田赋蠲免的某些原因，径山寺在乾道九年之前实际上已经拥有不少的田产，高宗曾因大慧妙喜之故赐田径山寺，其记载“高宗既御北内得以游幸山间，以妙喜故，赐吴郡吴郡田万亩，驾幸越二年始建龙游阁”^⑧、这则材料并没有明确高宗赐田径山寺的时间，但结合《咸淳临安志》卷83《径山能仁禅院》中“乾道四年（1168）乃建龙游阁”^⑨的记载来看，高宗赐田时间应为乾道二年亦即1166年，在这里仍有两点值得注意，虽然乾道二年在位的皇帝是孝宗，赐田径山寺的却是宋高宗，然而游彪先生在其所作《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一书中却将赐田者定为孝宗皇帝，并且又说“无独有偶，乾道二年（1166），著名禅宗大师宗杲又得到孝宗所赐长洲田一万亩。”^⑩在此可见是犯了历史知识的错误，此为其一。其二，大慧妙喜即是大慧宗杲，其在1163年即孝宗隆兴元年去世，故而绝不可能在乾道二年（1166）接受皇帝赐田，而此次赐田亦只能说是出于皇室对于大慧禅师的怜敬，实际上大慧禅师并不是直接的受赐者，在游彪著作之前，台湾学者黄敏枝女士《宋代佛教经济史论集》第二章《宋代寺田的来源与成立》之《宋代敕赐寺田表》中的第16、18条中同样有这样的失误^⑪。而就在径山寺接受赐田的同一年和王杨存中曾舍径山寺田达13000亩之多，这部分舍田的赋税其后被孝宗下令蠲免，记载说杨存中“舍苏州莊与径山，朕当为蠲免赋税，和王谢恩，归即以莊隶径山，此莊岁出二万斛，犁牛、舟车、解库应用百事具足。”^⑫

从径山寺拥有田产的数量来看实属不少，其田赋一旦免除势必对于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乾道九年孝宗皇帝下令只减免其杂税而例行收取正税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也可以看出，寺院田赋的蠲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政府审时度势所作出的适当调整。又比如孝宗在蠲免径山寺田赋之后三年，亦即乾道七年，曾下诏寺观“毋免税役”^⑬。对于此次下诏禁止寺院免除税役，其原因亦正是朝廷出现了一时的财政短缺，据史料记载当年孝宗下令“罢会子库，仍赐户部内藏南库缗

钱二百万、银九十万两，以增给官兵之奉”^⑭。可见当年当月出现了会子库及巨额经费支出等问题，故而政府通过重申法规条令来禁止寺观免纳田税。寺院田赋之所以能够得到蠲免，有时也缘于别有奇能的高僧大德之影响力，诸如上述径山寺因大慧禅师之故而被免除田税，史料记载孝宗对妙喜禅师“怜而敬之，宠眷尤厚，赐钵袈裟。”^⑮又偃溪禅师住持径山寺时，于庚申年（庆元六年，1200）赐号佛智，其凭借佛教影响力，上奏朝廷免除了径山寺旧庄田产税租。史料记载：“庚申赐号佛智，旧庄二所，指水为田，东饷按籍索租，害此寺二纪，师为奏免。”^⑯

寺院由于高僧大德的影响力而被蠲免田赋的情况实际上最终还是取决于世俗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及行为，历数南宋时期寺院田赋的蠲免事例，无不是统治阶级以高姿态的架子对寺院施以恩惠。旌德显庆寺嘉定初年为宁宗皇后杨氏功德院，寺院存有宁宗皇帝之御书，后理宗皇帝买田以赐，达3000亩之多，为尽复其赋^⑰。度宗时期寿圣寺为御前香火寺，科敷借占等杂税曾受旨得以蠲除，其寺田山园地等常住，在毗陵（今江苏常州地区）、霅川（湖州别名，今浙江湖州地区）、本邑有4500亩之多，岁有常赋，后太傅平章魏公上奏朝廷免之^⑱。

上述显庆寺的材料中有皇帝亲自买田、赐田并免田赋的记录，这是在南宋历代皇帝中所极少见到的情形，根据宁宗当朝时期《庆元条法事类》中的规定，蠲免寺院田赋已是基于朝廷极为慎重的考虑，因为大量赋税的蠲免势必带来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更何况还要皇帝花费钱财买下大量田产施与寺院，作为宁宗的继任者，宋理宗究竟出于何种考虑有此行为，或许史料中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南宋相关史料显示理宗与显庆寺关系较之他与其他寺院关系更为密切，显庆寺历来为宋朝祖宗功德寺，在淳祐庚戌年时，（亦即淳祐十年，1250）理宗曾为其宠幸的贵妃阎氏建功德寺于附近的九里松，而对于功德寺的修建，史料记载“显庆寺，土木之工过于诸寺，时人名之曰‘赛灵隐寺’。”^⑲能与当时已位列五山之一的灵隐寺相比较，可见其寺院规格定然不低，以至其后有“界限甚严，无故者不得复入”的规定^⑳。然而真正促使理宗对于显庆寺进行经济宽免的原因或许并不仅仅于此，因为作为具有皇家祭祠功能的佛寺，显庆寺还是宁宗皇后杨氏的香火院，而宁宗皇后杨氏对于理宗有“再造之功”——杨氏曾与权臣史弥远合作废黜太子，并收理宗为子，后将其扶上皇位。这在《资治通鉴后编》卷13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91、《宋史纪事本末》卷24、《经济类编》卷3等史料中均有相似的记载。现仅引用《宋史纪事本末》卷88《史弥远废立》中的记述：閏月丁酉，帝崩，弥远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岂敢擅变，谷等一夜七往返，

后终不许，谷等乃拜泣曰：内外军民皆以归心，苟且不立之（宋理宗赵昀——笔者按），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弥远即于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万岁巷皇子…昀入宫见后，后拊其背曰：汝今为吾子矣…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璫为荣王，生母全氏为国夫人，而以弟与芮嗣之^⑧。而对于一向尊崇道学（亦即理学）的宋理宗来说，继位之后标榜皇权正统，通过具有祭祀、禳灾功能的祠庙、寺院为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寻找神圣依据，应该是隐约可以想到的，但是现在囿于史料的短缺尚不能完全证明理宗对显庆寺经济的宽免是由于以上所述，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对显庆寺外，至今为止宋史史料中未发现宋理宗对于其他寺院进行买田、赐田并蠲免其田赋的记载，所以从显庆寺与理宗特殊的因缘关系中去探讨其田赋得以蠲免的情况或许是一个可能性的角度。

从以上所引材料不难看出，田赋税收能够得以蠲免的寺院多是赐额寺院、皇族及官员的香火寺及功德院，诸如径山寺、显庆寺、寿圣寺等，而极少见普通规格的寺院，事实上大多情况下寺院除要缴纳田赋正税以外，还要承担相当沉重的田赋附加及各类科敷，这对于赐额寺院、功德院等不时享有免税权力的寺院来说，税负压力往往比普通寺院较轻，而普通寺院往往因为承受不起田赋附加税及其他科敷而衰落，针对这一点，黄敏枝女士在其《宋代佛教经济史论集》一书中亦有提及到^⑨。但是实际上更应当注意的是，南宋时期寺院田赋的蠲免绝不是形式上简单的赐受关系，而是有更为深层次的社会缘由，寺院田赋的蠲免并非是世俗统治者对于佛教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宽赦和扶持，更为准确地讲，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世俗政权对于佛教经济更为强化的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加强对于佛教的管理与控制，佛教的社会发展亦因此更为倚重世俗政权。一些规模较大的寺院亦逐渐类似于皇族成员的“家庙”，而这种家庙化的出现势必对佛教的独立性发展带来诸多的困难。

三、南宋寺院田税征收及蠲免的社会影响

寺院田税征收与蠲免无论如何进行都始终无法避开一个问题——即田产供给问题，因为缴纳或是蠲免多少两税是根据田产数量及质量作为衡量的，而在土地的供给上，政府显然处于主导地位，而另一方寺院为得到土地亦往往毫不掩饰其觊觎之色。诸如南宋时期理学家黄干曾有著作《勉斋集》，其中记载了抚州金溪县白莲寺僧如璫与官员卢嘉猷争夺田产的讼案：卢嘉猷之田在港东，白莲寺之田在港西，两家之讼，初争田，次则舍田而争水圳，其终又舍水圳而争水港^⑩。先置田产归属问题不论，就白莲寺僧的行为来看，其追求田产利益的欲望就

已显现无疑了。针对寺院对于田产的需求这一状况，南宋政府有时采用实封的形式将田产赐予寺院，寺院则报之以田税杂科，南宋刘克庄曾对福建地区寺院接受实封的情况有所记载，他说：“闽中僧刹千五百区。旧例，住持入纳，以十年为限，谓之实封。官府科需，皆僧任之，不以病民。近以州用不足，减为七年或五年，甚者不一岁，托以词讼，数易置。”^⑪也就是说官府将田产赐予寺院，并任寺院住持进行管理，届时收取田产科敷，如出现州用不足亦即财政短缺的情况时，政府则将住持任期缩短，由10年改为7年或5年，甚至1年，通过这种方式，每立一次住持便可向寺院征收大量财税，这种做法显然是侵犯了寺院的经济利益，故而极易招致诉讼，然而好在政府实封田产之时“皆僧任之，不以病民”，实封田产虽然损害了寺院的利益，但也应该注意到一定程度上实封之制还是缓解了百姓缴纳田赋杂税的压力，如南宋初期，张守知福州时曾与当地官员实行实封，“存留上等四十余刹，以待真僧传法，余悉为实封，金多者得之，岁入不下七八万缗，以是助军兵春冬二衣，余宽百姓非泛杂科。”^⑫出金多者才能得到实封的田产，颇类似于现在的拍卖形式，从记载上看，这些田产岁入极为丰富，资助军兵春冬二衣绰绰有余，亦起到了缓解百姓科敷压力的作用。

通过实封所纳田税，一时确实起到了支援军费、缓解百姓科敷压力的作用，但是寺院田赋的蠲免亦往往给民户带来不小的压力，因为寺院田赋一旦蠲免，其所免税额往往摊由民户承担，对此宁宗开禧年间曾有大臣奏议：寺观蠲免田产过多，则上供、送使、留州的税额势必减少，而这部分必定转而抑配于其他^⑬。又孝宗淳熙年间，有官员曾指出两浙地区“僧道寺观之产，或奉诏蠲免而省额未除，不免阴配民户，此暗科之弊也。”^⑭可以看出寺院田赋一旦蠲免势必影响到普通民户的田税缴纳，也可以看出寺院、民户、官府在田税输纳问题上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三者始终处于某种博弈的状态。就寺院与官府在田税问题上来说，两者相互依存亦相互排斥，政府有时会根据寺院田赋的缴纳情况差拨住持及赐予田产，诸如高宗于绍兴二年曾下令诸路寺观常住荒田令州县召僧道垦耕，内措置有方及税租无拖欠者并仰所属差拨住持其田宅^⑮。

政府实封田产及以上诸实例亦可以证明政府对于寺院田产及田税的缴纳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且掌握着寺院住持的任命权，而寺院有时亦因利益的驱使乐意承接来自官方的恩惠，并为政府提供定量的财政税收，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寺院则又成为政府搜刮财税的对象，而寺院往往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其享受田税蠲免的特权亦逐渐丧失。

最后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寺院田税问题体现出南

宋社会的时代性,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南宋时期的寺院经济特权已与唐及以前相比无多少优势可言,一方面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南宋寺院经济的发展势必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以至于对国家经济财富及世俗政权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加之南宋时期种种社会问题其实质仍旧是北宋三冗问题的延续,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此形势下,国家必然会对寺院财产进行极大程度地敛征及相应地政治控制。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土地这种农业资源不再强制性的将人限制起来,加之非主体阶级的出现^⑨,致使国家对于土地生产力的控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减弱,进而国家转向对于土地的控制,因此对拥有大量田产的寺观进行强制性收税便成为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控制手段。

(责任编辑:又小易)

-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21页。
- ②[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③[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④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278页。
- ⑤[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5《陈光仲常卿墓志铭》,四部丛刊本,第216册,第7页。
- ⑥[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30页。
- ⑦[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19—4220页。
-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591页。
- ⑨[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⑩[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48《赋役门·支移折变》,燕京大学图书馆校印本,1948年。
- ⑪[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48《赋役门·科敷》,燕京大学图书馆校印本,1948年。
- ⑫[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⑬[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13页。
- ⑭[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⑮杨倩描:《南宋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 ⑯王曾瑜:《宋代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页。
- ⑰[宋]曹勋:《松隐集》卷3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⑱[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⑲[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83《径山能仁禅院》,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⑳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6—77页。
- ㉑详细参看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56页。因寺院赐田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而不再进行赘述,关于此次赐田记载的补正,亦可参见汪圣铎、马元元:《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载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48—52页。
- ㉒[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㉓[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50页。
- ㉔[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50页。
- ㉕[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㉖[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21《径山偃溪佛智禅师塔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其中有“庚申”之记载,与《续藏经》第69册《偃溪和尚语录卷下》“辛酉”之记载有所出入,其记载如下:“辛酉(1201)赐号佛智,旧庄二所,指水为田,东饷按籍索租,害此寺二纪,师为奏免。”(《偃溪和尚语录卷下》,《续藏经》第69册,第753页。)关于偃溪禅师驻锡径山寺的时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在此不作考据。
- 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㉘[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8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㉙[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1《显庆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㉚[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1《显庆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㉛[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91—992页。
- ㉜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318页。
- ㉝[宋]黄干:《勉斋集》卷32《白莲寺僧如琰论陂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9年。
- ㉞[宋]刘克庄:《村先生大全集》卷146《忠肃陈观文神道碑》,四部丛刊本,第215册,第19页。
- ㉟《宋会要》食货26之42。
- ㊱《宋会要》食货70之104。
- ㊲[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39页。
- ㊳《宋会要》食货61之81。
- ㊴王曾瑜:《宋代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396页。